

吴语名词性短语的指称特点

——以富阳话为例*

李旭平

提要 本文探讨北部吴语富阳话中四类名词性短语在独用或者被修饰时的指称特点,包括名词短语、量名短语、数量短语和指示词短语。首先,富阳话的普通名词,无论是否有修饰语,都只能表示类指或通指,而没有定指和不定指等个体指用法。其次,富阳话需要借助量词来表示个体指,只有量名短语才可以表示无定或有定,其中当有修饰语时,量名短语只能为有定。数量短语是强无定性的表达,一般不受关系从句等修饰语的修饰,但是概数词“两几”是个例外,它可以有定指的用法。指示词短语是一种有定表达,但富阳话没有“关内式”关系从句,只有“关外式”,即关系从句只能出现在指示词左侧,这与富阳话的光杆名词的语义制约有关。

关键词 光杆名词 量词 指示词 类指 有定 无定

1. 引言

通过对比研究普通话和广东话名词短语,Cheng and Sybesma(1999)指出普通话的光杆名词可以有类指(kind)、不定指(indefinite)和定指(definite)三种解读,如(1),而广东话的光杆名词只有类指和不定指的用法,而没有定指的用法,如(2a-b)。作为补偿机制,当表示定指时,广东话则使用量名结构,如(2c)。

(1) 普通话

- a. 鲸鱼是哺乳动物。 [类指]
- b. 我看见了鲸鱼。 [不定指]
- c. 鲸鱼受伤了。/* 条鲸鱼受伤了。 [定指]

(2) 粤语(Cheng and Sybesma,1999:510-511)

- a. 狗中意食肉。 [类指]
- b. 吴菲去买书。 [不定指]
- c. * 狗要过马路。/ 只狗要过马路。 [定指]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两种方言的光杆名词和量名短语一定程度上呈现互补分布。普通话的量名短语只能有不定指的解读,要表示定指则应使用光杆名词,而粤语的量名可以有不定指或定指的解读,而它的光杆名词不表定指。因此,粤语量词的功能比普通话要更为发达一些,或者说,普通话的光杆名词的语义诠释比粤语更为宽泛。刘丹青(2002b)指出,粤语和吴语都

* 《中国语文》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对文章具体观点的形成和结构编排起了很重要作用,在此表示感谢。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语方言定指量词的语义语用互动研究”(项目号:14YJC740043)的资助,特此申谢。文责自负。

属于“量词强势型”语言,而普通话则是“指示词强势型”语言。如果从名词性短语的指称关系来看,吴语富阳话的指称类型应该与广东话更为接近,但它们也不全然一样(见表1)。^① 根据后文的论述,与普通话和粤语相比,吴语光杆名词的使用范围最受限制,它一般只能表示类指(或通指),而不能表示定指和不定指,后者的任务落到了“量名”短语身上。从这个角度看,吴语可能是一种比粤语更具有“量词强势型”这一类型特点的方言。^②

表1 普通话、粤语、吴语中光杆名词和量名短语的语义内涵

	普通话		粤语广东话/香港粤语		吴语富阳话	
	光杆名词	量名短语	光杆名词	量名短语	光杆名词	量名短语
表类指	+	-	+	-	+	-
表定指	+	-	-	+	-	+
表不定指	+	+	+	+	-	+

在名词短语跨方言语义差异的背景下,本文考察北部吴语富阳话中四类名词性短语独用或被修饰时的指称性质,包括光杆名词(NP)、量名短语(CIP)、数量短语(NumP)和指示词短语(DemP)。就修饰语而言,我们以关系从句为例考察它对名词中心语的语义限制或要求。

普通话的关系从句一般由定语标记“的”引导,可以修饰光杆名词,如例(3);或者指示词短语,如例(4)。当修饰光杆名词时,该短语可以有定指和通指(generic)两种解读。例(3a)主语位置的光杆名词“同学”为定指,表示某个(或某些)特定的戴眼镜的同学;(3b)的主语可以解读为通指,泛指任何戴眼镜的同学。当关系从句修饰指示词短语时,它可以出现在指示词辖域的内部(4a)或外部(4b),前者称之为“关内式”关系从句,后者为“关外式”关系从句(唐正大(2007)术语)。根据Chao(1968),(4a)的关系从句是描述性的,(4b)的关系从句是限定性的(参看唐正大(2005)对这两类关系从句功能差异的讨论)。

- (3) a. [RC戴眼镜的]同学走丢了。 [定指]
 b. [RC戴眼镜的]同学学习都很用功。 [通指]
 (4) a. 那个[RC戴眼镜的]同学是上海人。 [“关内式”关系从句]
 b. [RC戴眼镜的]那个同学是上海人。 [“关外式”关系从句]

富阳话的关系从句必须由结构助词“葛”引介。^③ 相较于普通话,吴语富阳话关系从句的中心语类型更为丰富,它可以是(a)光杆名词、(b)量名短语和(c)指示词短语(或数量短语)。富阳话这三类关系从句的构成和所表达的意义与普通话的关系从句有明显差异。

① 富阳话属于吴语太湖片临绍小片,通行于杭州市富阳区,约有65万左右的母语者。本文所用语料主要体现了富春江江南一带乡镇(灵桥、春江)所使用的富阳话的用法特点。本文作者为富阳话母语者。

② 根据刘丹青(2002a:416)对苏州话的论述,由通用量词“个”构成的量名短语“个+名词”甚至可以表示“类指”(a-b),但是特殊量词则只有个体指示的用法(a'-b')。不过,富阳话的“量名”无类指用法。综合比较这几种方言,可能苏州话的量名短语所表示的语义范围是最为广泛的。

a. 个蛇是蛮怕人葛。(这蛇是挺让人害怕的。) a'. 条蛇咬仔俚一口。(这蛇咬了他一口。)
 b. 个电脑我也勿大懂。(这电脑我也不大懂。) b'. 部电脑拨俚弄坏脱哉。(这台电脑被他弄坏了。)

③ 同属于北部吴语的苏州话,用不同的语法标记来引介关系从句。根据刘丹青(2005)的考察,苏州话至少包括以下三种从句标记形式:

a. 定语标记“葛”(相当于普通话里的结构组词“的”): [[小张买葛]书]穷好看。
 b. 定指量词 [[小张买][本]书]穷好看。
 c. 半虚化的处所词-体标记,如“勒海”: [[我摆勒海在/着]饼干]啥人吃脱哉?

首先,富阳话中关系从句修饰光杆名词时,该名词短语往往表示通指,而不能表示定指。

- (5) a. [[我买葛]书]都打折过格。 [关系从句+光杆名词:通指]
 b. * [[我买葛]书]寻勿着噶了₂。 [关系从句+光杆名词:无定指解读]

其次,富阳话有两类普通话没有的关系从句。第一类,富阳话的关系从句可以修饰量名短语,表示定指,如(6a)。第二类,我们可以在(6a)的基础上在该名词性短语前再加上一个定指量词,构成“量词+关系从句+量词”,我们称之为“框式量词式”关系从句(参看方梅(2004)讨论的“框式指示词式”从句)。

- (6) a. [[补鞋子葛]个老信家伙]到何里哪里去噶了?₂ [关系从句+量名:定指]
 b. [个[[补鞋子葛]个老信家伙]]到何里哪里去噶了?₂ [框式量词式关系从句:定指]

第三,富阳话只有“关外式”关系从句,而无“关内式”关系从句,即指示词只能出现在关系从句的域内。

- (7) a. [[我早间早晨买葛]唔搭那本书]打折过格。 [关系从句+指示词]
 b. * [唔搭本[我早间买葛]书]打折过格。 * [指示词+关系从句]

富阳话和普通话几类名词性短语被关系从句修饰时的指称差异简单归纳如表2。

表2 普通话和富阳话名词性短语修饰后的指称异同(“—”表示无此用法)

	修饰短语内部结构	普通话	吴语富阳话
第一类	关系从句+光杆名词	通指	通指
		定指	—
第二类	关系从句+量名短语	—	定指
	量词+关系从句+量名	—	定指
第三类	关系从句+指量+名词	限定性	限定性
	指量+关系从句+名词	描述性	—

2. 光杆名词的指称: 通指和类指问题

2.1 “通指”和“类指”的界定

在讲述富阳话光杆名词的指称之前,有必要对几个涉及指称的术语进行梳理,尤其是“通指(句)”和“类指(句)”这一组概念,以便更好地理解不同作者使用该术语时的具体内涵。

通指句(generic sentences)包括类指句(kind generics)和特征句(characterizing statements)两大类。类指句是指对某类物体的类属特征作出描述的句子(“kind generics involve reference to an entity that is related to specimens” Krifka et al., 1995)。这类句子往往出现在科学性较强的语境和文体中,如生物或自然课本之类,如例(8)所示。其中,“绝种”“进化”等谓语只能是表示某类物体或物种的特征,而不表示某个特定个体的特征。刘丹青(2002a)将其称为“属性谓词”(kind-level predicate),其相应的主语则必须解读为类指(kind referring)。所以,(8a)表示“黑脚貂这种动物快绝种了”,(8c)表示“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这种东西”。

- (8) a. 黑脚貂快绝种了。 b. 鸟是恐龙进化而来的。
 c. 爱迪生发明了灯泡。 d. 金丝猴很罕见。

特征句表示对某个个体集合或情景集合的某种特征总结和概括(“characterizing statements express generalizations about sets of entities or situations” Krifka et al., 1995)。英语中这类句子的主语一般为光杆单数(bare singulars)或者光杆复数(bare plurals)形式。从形式上看,它们均为无定短语,但是在指称上,它们不指向任何具体个体,即所谓的通指。汉语中光杆

名词是典型的通指表达,如(9c),但是“一量名”和“这量名”也可以用于特征句表通指,如(d)和(e)(刘丹青 2002a;方梅 2002)。这一类通指表达区别于类指表达,因为它们只表示单数或复数个体的集合,在语义上理解为可以被通指算子 GEN 约束的变量 x。

- (9) a. A gentleman opens doors for ladies.
b. Potatoes contain vitamin C.
c. 猫吃鱼 狗吃肉骨头。
d. 一个学生应当刻苦学习。(刘丹青 2002: 418)
e. 这女人全是死心眼。(方梅 2002: 156)

类指句的通指特征来源于“类指名词”本身,而特征句的通指性则是植根于整个句子或命题,即整个句子表示关于个体的某种特征的概括(Cohen 2001)。两者的区别在于,特征句需要足够多的个体具备这个特征,从而使之成为一种规律或概括(generalization),而类指句的谓词所表述的特征只适用于某类个体,而不能是某个个体的特征概括。例(8)(9)这两类通指句中的主语均可以被称为广义上的通指成分(generic NP),其中类指句的主语可以称为类指名词(kind terms),而特征句的主语则可以称为狭义上的通指成分。^④

张伯江、方梅(1996: 156-157)在讨论“这女人全是死心眼”这类句子时,指出此处的“女人”不是特指某个具体的女人,而是指“所有女人”。“这种着眼于一类事物通称的名词被称为通指成分(generic NP 或译为类指)……汉语里通指成分典型的用法是在名词前加‘这种,这类’一类成分,而不能加‘这个,这几个’等”(方梅 2002)。“通指”这一汉译术语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陈平(1987)。从严格意义上看,张、方文中所说的通指短语只对应于特征句的主语,即狭义上的通指表达。

刘丹青(2002a: 411)专文讨论了汉语中的“类指”。他指出,“类指专指 Chierchia(1998)所说的 kind-denoting 或者 reference to kinds。它大致相当于文献中更常用的 generic(译为通指或类指),但 generic 的含义更加复杂多样”。他在后文又明确强调,“类指(kind-denoting)是一种凸显内涵、暂时抑制了全量外延的成分,可视为 generic(类指、通指)这个术语最原型的理解;generic 这个术语所指称的,除了 kind-denoting 以外,还包括若干种偏离原型的变体”(刘丹青 2002a: 420)。纵观全文,刘丹青(2002a)文章中并未使用“通指”这一术语,但从他所讨论的例子来看,“类指句”应该是包括了类指句和特征句两类句子,所以他的“类指表达”可能更接近广义上的“通指表达”,包括类指名词和特征句中的通指主语。

由于 generic 这一术语本身对应于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可以分别从广义和狭义去理解。为了避免 generic 引起的歧义,本文拟采用“广义的通指表达包括类指表达和狭义的通指表达”这一分类方法。

2.2 光杆名词的指称

在吴语富阳话日常对话中,光杆名词的使用有诸多限制,其使用频率要大大低于量名短语。具体来说,富阳话的光杆名词往往只有通指的用法,而没有表示个体指称的定指或者不定

^④ 关于 generic 这一术语的使用,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第一 generic 可以作名词,如 BP generics 和 IS generics,此时一般表示通指句,即 BP 和 IS 分别做主语的通指句。第二 generic 可以作形容词使用,如 definite generic NPs (Kriifka 2002),以及 generic indefinite singulars 和 generic bare plurals(Cohen 2001)。它表示对 definite NPs, IS 和 BP 这种本身有多种解读的名词性短语的一种限制和选择,如区分类指和个体指,或区分特指和非特指。因此,从广义上看, generic NP 可能的解读应该包括类指解读和(狭义上)的通指解读。

指之类的用法。富阳话表示定指或者不定指的功能一般由量名短语承担。

在真实的日常语境中,由于方言语境(register)的限制,我们很少使用或听到用方言表示类指句;即使偶尔会听到,也往往是从普通话直接对译而来。尽管方言中类指句较为贫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语境中观察到光杆名词表示类指的用法。虽然类指名词的典型位置是主语或话题,但是富阳话中光杆名词可以出现在动词宾语的位置上,表示类指。如例(10)的“书”“饭”和“香烟”都应该解读为类指。

- (10) a. 我读书上学去。
b. 好可以吃饭噶了₂。
c. 吃香烟吃勒了三十年!

我们认为,例(10)只表示“读书”(study)“吃饭”(dine)或“抽烟”(smoke)的事件整体,本身不涉及名词的指称为有定或无定,所以它类似于“宾语融合结构”(object incorporation)。该结构中的光杆名词应解读为类指(kind denoting),而不能解读为表示具体个体的不定指或定指。汉语的该类结构类似于英语的NV复合词,如例(11)的baby-sitting和apple-picking这样的表达,其名词为光杆形式,并且不能做代词的先行词。对比(11)和(12):

- (11) a. Jane is baby-sitting. * It/* she/* they/the baby is acting cranky.
a'. Jane is looking after babies. They/the babies are acting cranky.
b. I went apple-picking. * They/the apples were sweet.
b'. I picked apples. They/the apples were sweet.
(12) a. 我读书去。#渠蛮难读。
b. 好可以吃饭噶。#渠将刚刚烧好。
c. 吃香烟吃勒三十年。#渠蛮贵。

相对于类指句,富阳话中的特征句还是较为常见的,毕竟归纳、总结是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日常言语行为。例(13)中的例句均应分析为“特征通指句”。如(13a)表示,“作为一种常识,蒸的菜比炒的菜更健康”,其中的主语“菜”不特指某一盘菜,大致可以解读为所有或凡是蒸的菜,是一种(狭义)通指表达(Krifka et al., 1995)。特征句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所表示的规则/规律允许反例的存在。比如(13c)并不表示所有的山东人都比浙江人高,而是一般说来,存在“北高南矮”的趋势。

- (13) a. 菜炒葛还是蒸葛健康。 [光杆名词:(狭义)通指]
b. 外国,肉还是菜贵,水还是牛奶便宜!
c. 山东人比浙江人长高。

普通话的光杆名词不仅可以表示类指和(狭义)通指,还可以表示无定和有定等个体指称用法。比如,“晚上,我吃了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我吃了一点儿面”,其中的宾语为无定。再如,“面,我早吃完了”中的“面”则解读为有定。关于普通话光杆名词有定和无定在句子中如何分布,以及受何制约,前人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我们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在吴语富阳话中,光杆名词没有无定或者有定的解读。普通话这两个例子中的光杆名词富阳话都会相应地使用“量名”短语来表示有定或无定的个体指,如例(14)(15)。

- (14) a. 我昨晚头吃勒了*(碗/丢点)面。 (无定)
b. 旧年子,阿拉造勒了*(间)房子,买勒了*(部)车子。
c. 我今朝要则和(两个)弟兄家哥们儿一总生一起吃饭。
(15) a. *(部)脚踏车破掉噶了₂。 (有定)

b. 你*(碗)面吃吃光!

由此可见,普通话的光杆名词是通指(包括类指和狭义通指)、有定和无定三分对立的格局,但是吴语富阳话的光杆名词的语义功能非常单一,只能表示通指,而表示个体指称的定指和不定指的功能则由量名短语承担。浙江省境内其他一些吴语方言的光杆名词的解读,如东阳话,也存在着和富阳话类似的情况。

2.3 关系从句中光杆名词的指称

当光杆名词被关系从句修饰时,它的解读是否和单独使用的情况一样?

例(16)展示了“葛”引导的关系从句修饰光杆名词的情况。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这三个例句均为典型的特征通指句,是对一般情况的概括,而非“事件句”(episodic sentence);第二,[关系从句+光杆名词]一般只能出现在主语或者话题的位置;第三,其中[关系从句+光杆名词]不表示定指或特指,而是通指性名词短语。它们的解读与例(13)中的光杆名词类似。

(16) a. [[讲过葛]摊头话语]要算数。

b. [[苍蝇叮过葛]菜]吃不得格。

c. [[上半年生葛]小人小孩]还是[[下半年生葛]]好。

即使有时候被关系从句修饰的名词短语有很强的有定性倾向,但它们的使用环境仍是通指句。例(17)的两种情况下,都不是指特定的一餐饭或者一包香烟,而是泛指“你烧的饭”和“他吃的香烟”。(17a)有一定的情态意义,表示“你烧的饭我永远不会来吃”,是对不可能情况的一种概括;(17b)是对“他吃的香烟”的特征的一个概括。

(17) 特征通指句(characterizing generics)

a. [[你烧葛]饭]我勿来吃。

b. [[伊吃葛]香烟]都蛮贵格。

当表示定指或特指时,中心语往往为量名短语或者指示词短语。试比较例(17)与(18):

(18) 事件句(episodic sentences)

a. [[你日中中午烧葛]顿饭]我勿吃。

b. [[伊将刚吃葛]格支香烟]蛮呛格。

“关系从句+光杆名词”唯一不用于通指句的情形是,当主句的谓语表示数量关系时,该复杂短语似乎可以表示有定。如(19a)表示他所造房子的数量之多;(19b)表示我今天摘的茶叶的数量多于前天摘的茶叶数量。

(19) a. [[伊造过葛]房子]无千得万成千上万。

b. [[我今朝摘葛]茶叶]比前日子前天多。

综上,吴语富阳话中,普通名词,无论是使用其光杆形式,还是使用非光杆形式(如被关系从句等修饰性成分修饰),它都只能解读为类指或(狭义)通指,不可能有定指或不定指这些表示个体指的用法。因此,从句法上看,吴语光杆名词的最大投射只能是名词短语(NP),而不可能是数量短语(NumP)或限定词短语(DP),即它没有所谓的空(null)的量词或限定词。

3. 量名短语的指称:个体指

吴语富阳话中使用不同的名词短语形式来表示通指和个体指。我们在第二部分看到,富阳话的光杆名词只能表示通指,但是不能表示有定和无定等个体指的用法。在这种语言中,我们往往需要借助量词来表示个体指,其背后的语义机制可能是量词可以将光杆名词从其类指解读转换(type-shifting)成相应的个体指解读。

3.1 量名短语的有定性和关系从句的关系

根据 Li and Bisang(2012) 的考察,富阳话中量名结构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解读为有定或无定。这两种解读的区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句法位置和信息结构。一般来说,位于动词前的量名短语解读为有定,而动词后的量名短语则为无定,因为前者往往充当(次)话题,后者充当焦点表新信息。^⑤ 详见例(20):^⑥

- (20) a. SVO: [个美国老师]有定买勒了[本中文书]无定。
b. SOV: [个美国老师]有定[本中文书]有定买嘞了₂。
c. OSV: [本中文书]有定,[个美国老师]有定买嘞了₂。

当光杆名词有修饰语时(如人称代词、形容词、介词短语和关系从句),它们只能解读为有定。如例(21)所示,这些复杂名词短语可以不求助于存在量化词“有”或者分配算子“都”,独立做主语,并且表示定指。

- (21) a. [[我]本书]无掉不见嘞了₂。 [人称代词+量名]
b. [[桌床浪桌子上]本书]无掉不见嘞了₂。 [介词短语+量名]
c. [[红葛]本书]无掉不见嘞了₂。 [形容词+量名]
d. [[我买葛]本书]无掉不见嘞了₂。 [关系从句+量名]

我们着重介绍量名短语被关系从句修饰的情况。例(20)提到量名短语本身有有定或无定两种解读的可能,但是,一旦它们被关系从句修饰后,该复杂量名短语只能解读为有定,如例(22):

- (22) a. [[门口种葛]株杨梅树]一卯一次勒都还未生过。
b. [[你写拨给我葛]封信]我看勒了三卯三次。
c. [[你上日子昨天买葛]双球鞋]多少钞票?

“关系从句+量名”的有定性可以从它被允许的句法位置得到验证。富阳话中被关系从句修饰的量名短语只能出现在动词前的论元位置。如例(23)所示,普通话中被关系从句修饰的名词性短语也表示定指,它可以出现在动词后做宾语。但是,吴语富阳话中,当宾语是“关系从句+量名”时,它不能出现在SVO的语序中(24a),只能通过前置(object preposing)等手段,出现在SOV(24b)或者OSV(24c)这两种语序中。

- (23) 我弄丢了[你昨天买的那双球鞋]。 [普通话]
(24) a. * 我无掉弄丢[你昨日子昨天买葛双球鞋]嘞。 [富阳话]
b. 我克把[你昨日子昨天买葛双球鞋]无掉弄丢嘞。
c. [你昨日子昨天买葛双球鞋]我克把你无掉弄丢嘞。

量名结构表示有定时,其指称对象为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熟悉”的某个个体,即能从语境中获知足够信息确定谈论的对象(刘丹青,2005; Li and Bisang,2012 “familiarity”)。我们认为,关系从句的作用就是补充说明这部分语境信息,或使该语境信息显性化,从而有助于听话者确定说话者谈论的具体对象。

“关系从句+量名结构”除了使用个体量词表示单数之外(例21-22),也可使用非个体量

^⑤ Li and Bisang 提出的该规律适用于一般情况下(default setting)量名短语所获得的解读。一些特殊的动词或者谓语形式可以违逆(overriding effects)这一规律。比如,心理动词“喜欢”所带的宾语,虽然出现在动词后,但是它可以解读为有定。

^⑥ 富阳话中体标记“了₁”的语音形式为 *le?* 或 *te?*,其本字应为“得”,而“了₂”常见的语音形式为 *die*,应该是“得”和语气词的合音形式。

词或者不定量词表有定复数(plural definites)。例(25a)使用集体量词“班”表示一个复数概念“这班人”或者“这些人”。例(25b)中“种”是一个不定量词,可以对应于普通话的“些”;当表示有定时,它的意义为“这些”。这两例中,关系从句的作用和(22)例中相似,提供足够的语境信息,增加谈论复数个体的辨识度。

- (25) a. [[谈天葛]班人]我一个勒得勿认识。
b. [[阿拉我们格卯现在吃葛]种些水]是山泉水。

很多学者(如Li,1999)认为,虽然汉语没有定冠词,但是它可以存在一个完备的DP结构(如 $[_{DP} D[_{NumP} Num[_{ClP} Cl[_{NP} N]]]]$)因为它有指示词和人称代词这些定指性成分的存在。Li and Bisang(2012)提出,吴语(富阳话)也有一个类似的DP结构,并且认为吴语的定指量词必须实现在DP层面,即量词只有从量词中心语移位到限定词中心语后(Cl^0 -to- D^0 raising),才能得到一个有定的解读。换言之,无定的量名短语,量词处于 Cl^0 的位置,而有定的量名短语,量词处于 D^0 的位置。

我们认为,之所以富阳话中的量名短语一旦有了关系从句之类的修饰语,它只表有定而不表无定,是因为汉语没有“*数+关系从句+量+名”或者“*指+关系从句+量+名”这样的线性关系。归根结底是因为,汉语的关系从句的中心语一般要求为有定,不能是无定,如普通话的“关系从句+指量名”或“关系从句+光杆名词有定”,而在吴语中需要迫使量词移位到限定词 D^0 的位置或者使用指示词来满足这一有定性要求。

我们将在第4部分专门讨论数量短语的指称问题,我们也会考察数量短语和关系从句之间的制约关系。

3.2 “框式量词式”关系从句

普通话中关系从句有两种基本形式,“指示词+关系从句+名词”和“关系从句+指示词+名词”,见例(2)。除了这两种常见形式外,方梅(2004)发现在北京话中有所谓的“框式指示词”关系从句,即指示词可以分别出现在关系从句的前后,“指示词+关系从句+指示词+名词”。

- (26) a. 就是[那]最酸的,被各种糟人玷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
b. 所以另找了别人——就是[那]曾被李四爷请来给钱先生看病的[那位]医生。

吴语富阳话有类似方梅(2004)讨论的北京话“框式指示词”关系从句,但是组成框式成分的往往是量词,即“量词+关系从句+量词”,我们称之为“框式量词式”关系从句。

根据我们的观察,富阳话中“框式量词式”关系从句只适用于“主语关系化”(subject relativization),如例(27),不适用于“宾语关系化”(object relativization),如例(28)。

- (27) a. [个[[欢喜吃咖啡葛]个老师]]叫何事什么名字?
b. [个[[看门葛]个老倌]]是山里人。
c. [班[[割稻葛]班人]]到何里哪里去嘞了?
(28) a. * [袋[[上个月买来葛]袋米]]吃光嘞了。
b. * [只[[伊敲破葛]只碗]]勿值铜钿不值钱。
c. * [篇[[你写葛]篇文章]]叫何事什么?

除此之外,表示工具的名词也可以被关系化:

- (29) a. [把[[烧开水葛]把茶壶]]呢?
b. [部[[接客人葛]部车子]]拨给伊他们借去嘞了。
c. [只[[泡茶葛]只杯子]]无掉弄丢嘞了。

以上(27-29)三组例子,如果删除最左边的量词,所有句子全部成立。换言之,并不是所

有的中心语为量名短语的关系从句都能被嵌入另一个量词。“框式量词式”关系从句只接受主语或介词宾语关系化,但是不接受直接宾语的关系化。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和关系从句与中心语的语义关系直接相关。

我们在文章第一部分提到,富阳话的关系从句需要结构助词“葛”强制出现,起到引导关系从句的作用。但是(27)和(29)中的例子,关系从句引导词“葛”可以被删除。删除“葛”后的例子分别重复如(30)和(31)。我们认为,此时关系从句后的量词是一个关系化标记(*relativizer*),而最左边的量词是一个真正的定指量词。

- (30) a. [个[欢喜吃咖啡个老师]]叫何事什么名字?
b. [个[看门个老倌]]是山里人。
c. [班[割稻班人]]到何里哪里去嘞了₂?
- (31) a. [把[烧开水把茶壶]]呢?
b. [部[接客人部车子]]拨给佢他们借得去嘞了₂。
c. [只[泡茶只杯子]]无掉弄丢嘞了₂。

(30)例中被关系化的主语一般都是表人名词([+Human])或表有生命度的名词([+Animate])。中心名词被关系化后,它们类似于普通话语用“的”字结构表示一类人,如“喜欢喝咖啡的”“看门的”“割稻的”这一类结构。不过(30)例中“量词+关系从句+量词+名词”一般表示具有某特征的群体的某个具体代表。同样(31)例中介词宾语(更确切的说,工具格宾语)被关系化,所以它们可以表示具备特定功能的某一个工具,类似于“烧开水的”“接客人的”和“泡茶的”。这两类关系从句中,中心语和关系从句往往有某种较为单一的语义关系,比如主语关系化从句的中心语往往为施事者(*agent*),而工具格宾语关系从句的中心语往往表示工具(*instrument*),其中的量词可以看作是一个关系化标记。相对而言,当直接(或间接)宾语关系化时,中心语和关系从句的语义关系较为复杂,可以是受事(*patient*),历事(*experiencer*)或受益者(*beneficiary*)等。

例(30-31)两组例子中结构助词“葛”的省略或许正是和这种特殊的语义相关。我们可以暂且理解为主语/工具名词关系化过程中,关系从句和中心名词的语义紧密度较高,或原本的定指量词降格为关系化标记。最后,我们指出(27)和(30)(或者(29)和(31))虽然在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关系化标记“葛”的有无会影响名词短语的内在结构。简单来说,我们认为(32a)是核心标记手段;(32b)是从属标记手段,关系引导词“葛”是关系从句标记(参看刘丹青(2005)对苏州话的讨论)。

- (32) a. [只[泡茶只杯子]] b. [只[[泡茶葛]只杯子]]

本小节总结如下,吴语富阳话必须使用“量名”短语表示个体指。“量名”单独使用时,它可以表示无定或者有定,其相应的句法地位应分别为CIP和DP。但是,量名成分一旦被关系从句等修饰性成分所修饰,它只能表示有定,这是关系从句受“中心语有定性”这一语义要求的制约所导致的。

4. 数量短语和指示词短语的指称特点

4.1 数量短语的强无定性

汉语中(如普通话和吴语富阳话),数量名短语表示某种数量信息,它通常表无定。如(33a)中“三个同学”只有在存在量化词“有”出现的情况下,才能做主语;(33b)中如果没有全

称量化词“都”,无定表达“三篇文章”也不能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

- (33) a. * (有) 三个同学蹲勒门口等你。
b. 三篇文章* (都) 写好嘢。

我们在前文 3.1 小节中提到,关系从句所修饰的中心语一般需要有定短语。这一论断在数量短语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如(34)所示,富阳话中,数量成分一旦被形容词、介词等成分修饰后,所得到句子的接受度并不高。

- (34) a. ??? 桌床浪桌子上四本书是我格。
b. ??? 厚葛三床被放勒何里,我忘记掉嘢。
c. ??? 竹葛五个衣架破掉嘢。

提高例(34)中相关例句接受度的一种手段是在数量短语前插入指示词,如远指词“唔搭”(音:nta)。但是,由于富阳话的个体指示词源自方位指示词,比如“唔搭”本义为“那儿”,因此“唔搭+数量名”所指物体需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方位信息,否则句子还是不自然。对比(34)和(35):

- (35) a. 桌床浪桌子上唔搭那四本书是我格。
b. ??? 厚葛唔搭那三床被放勒何里哪里,我忘记掉嘢了₂。
c. ??? 竹葛唔搭那五个衣架破掉嘢了₂。

另外一种更为有效的提高这些句子的接受度的方法是把例(34)这些句子中的确数词换成高降调的概数词“两几”,如(36):

- (36) a. 桌床浪桌子上两几本书是我格。
b. 厚葛两几床被放勒何里哪里,我忘记掉嘢了₂。
c. 竹葛两几个衣架破掉嘢了₂。

也就是说,富阳话中表示确量的数量短语一般不能被修饰,而表示约量的数量短语“两几^{高降调}+量+名”可以被修饰语修饰。这是由“两几^{高降调}”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带“两几^{高降调}”的数量短语和量名短语一样,可以表示有定或无定,其具体解读由句法位置决定,如动词前(37a)和动词后(37b)的区别。不过,当有关系从句修饰时,该数量短语只能表示有定,如(37c)。因此,(36)例的情况和(37c)实属同一种情况。

- (37) a. 两几斤橘子你放好勒在何里哪里? [有定]
b. 我早间买勒两几斤橘子。 [无定]
c. [[娜阿姨担拿来葛]两几斤橘子]你放好勒在何里哪里?

我们提出,当数量短语“两^{高降调}+量+名”表示有定时,数词“两^{高降调}”需要由数词中心语的位置提升到限定词中心语的位置,即 Num⁰-to-D⁰提升。换言之,数词范畴中,由于使用频率等因素,概数词“两”的语法化程度可能要高于其他数词,更容易被重新分析成表示定指的成分。

4.2 指示词短语的强有定性

指示词短语一般表示定指,所以它们应该很容易接受关系从句的修饰。前文提到,普通话中关系从句和指示词至少有两种语序,即“关系从句+指示词+名词”和“指示词+关系从句+名词”,可分别称为“关外式”和“关内式”关系从句(唐正大,2005)。通过书面和口语文本对比研究,唐正大(2005,2007)发现,在书面语中“关外式”和“关内式”都使用,但是在口语中“关内式”基本不说。这一观点在我们考察的吴语富阳话的口语材料中得到验证。

富阳话的远指代词为“唔搭”,近指代词为“格”,在关系从句中远指代词的使用频率要大大高于近指代词。据我们观察,富阳话只有“关外式”而无“关内式”关系从句,即关系从句往

往出现在指示词左侧。对比使用远指代词的(38)与(39)近指代词的(40)与(41)。

- (38) a. [[你昨日子借来葛]唔搭那本书]呢?
b. [[渠上半年去葛]唔搭那个地方]叫何儿什么名字?
- (39) a. * [唔搭那本[[你昨日子借来葛]书]]呢?
b. * [唔搭那个[[渠上半年去葛]地方]]叫何儿什么名字?
- (40) a. [[你手把里驮拿葛]格只杯子]我美国买来格。
b. [[你将刚刚讲葛]格句滩头话]蛮有道理。
- (41) a. * [格只[[你手把里驮拿葛]杯子]]我美国买来格。
b. * [格句[[你将刚刚讲葛]滩头话]]蛮有道理。

我们认为,富阳话之所以没有类似于普通话的关内式关系从句和以下原因有关。吴语中指示代词必须和量词一起出现,即“格/唔搭+量词”才等于 this/that。一旦“格/唔搭+量词”这个成分出现在最左边后,关系从句所修饰的中心语变成了光杆名词,而非量名短语,这是富阳话所不允许的。正如我们第二和第三部分论述的,光杆名词被关系从句修饰只能表示通指;关系从句为事件谓语时,中心语往往需要由量名短语充当。所以像(39)和(41)这样的结构在富阳话中是不合语法的。

但是,指示词可以脱离量词,单独置于短语的最左边。省略量词时“唔搭”为处所指示词,表示“那里”。此时,“唔搭”不和后面的名词短语构成成分,所以可以有(42)这样的例句。

- (42) a. 唔搭那儿[黑颜色葛件衣裳]是何依谁格?
b. 唔搭那儿[底在叫葛只狗]是阿拉我们格。

小结如下,吴语富阳话中的数量短语是强无定性短语,而指示词短语则是强有定性短语,指称性的差异决定了它们能否被关系从句修饰。因为关系从句需要有定中心语,因此我们只有“关系从句+指示词短语”的语序,而没有“关系从句+数量短语”的语序。

5. 总结

本文对吴语富阳话的几类名词性的指称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首先,无论是否有修饰语,富阳话的光杆名词一般解读为狭义通指或类指,它通常做通指句的主语。换言之,类指是富阳话的光杆名词的固有解读,关系从句等修饰语并不能作为一个类型转换算子(type-shifter)将光杆名词从类指解读转换成表示个体的集合。这是富阳话光杆名词区别于普通话和粤语一个最为明显的语义区别。

第二,富阳话的名词表示个体指时,需要借助量词才能实现。光杆量名短语可以表示有定和无定。关系从句能赋予量名短语一个有定的解读,这些复杂短语通常出现在情景句的动词前。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富阳话的量名短语不是与生俱来就是有定的,其定指性需要在语境中得以确定,并且从句法上看,它借助修饰语等句法成分(或“提升(raising)”这一句法操作)才能实现。

第三,富阳话的数量短语一般情况下表示无定,也不能接受关系从句的修饰,但是唯独概数词“两几”除外,它可以有有定的解读,并且可以被关系从句修饰。这说明富阳话中的关系从句本身要求中心语为有定性成分。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富阳话的关系从句可以修饰指示词短语,但是只有“关外式”关系从句,而“关内式”从句几乎没有。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其光杆名词表示类指,不接受由“事件谓语”构成的关系从句修饰导致的。

参考文献

- 陈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2期。
- 方梅 2002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4期。
- 方梅 2004 《从章法到句法——汉语口语后置关系从句研究》，《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2002a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中国语文》第5期。
- 刘丹青 2002b 《所谓“量词”的类型学分析》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心讲座摘要。
- 刘丹青 2005 《汉语关系从句标记类型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
- 石汝杰 刘丹青 1985 《苏州方言量词定指用法及其变调》，《语言研究》第1期。
- 唐正大 2005 《汉语关系从句的类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唐正大 2007 《关系化对象和关系从句的位置——基于真实语料和类型分析》，《当代语言学》第2期。
- 张伯江 方梅 1996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Lisa and Sybesma Rint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Vol.30: 509-524.
- Cohen, Ariel 2001 On the generic use of indefinite singulars. *Journal of Semantics*, Vol.18: 183-209.
- Krifka, Manfred, Pelletier, Jeff, Carlson, Greg, ter Meulen, Alice, Chierchia, Gennaro and Godehard Link 1995 Genericity: an introduction. In Carlson, Greg and Pelletier, Jeff(1995), *The Generic Book*, 1-124.
- Krifka, Manfred 2002 Bare NPs: kind referring, indefinites, both or neither? *Proceedings of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Vol.13.
- Li, Audrey Yen-Hui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Vol.8(1): 5-99.
- Li, Xuping and Walter Bisang 2012 Classifi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from individuation to definiteness-marking. *Lingua*, Vol.122(4): 335-355.

李旭平 杭州 浙江大学中文系 xupingli@zju.edu.cn

第二届中法语言学论坛在武汉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湖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中法语言学论坛2017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武汉市举行。首届中法语言学论坛于2015年6月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和里昂高级研究院在法国巴黎高级研究院联合举办。中法双方二十多位学者参加。

本届会议开幕式由吴福祥教授主持，湖北大学赵凌云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所长、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罗端所长、湖北大学文学院刘川鄂院长先后致辞。来自中国大陆和法国的三十多位语言学学者出席会议并报告了论文，中国学者主要有储泽祥、董秀芳、方梅、洪波、胡建华、李宗江、刘丹青、卢烈红、陆俭明、马真、麦耘、沈明、石镔、谭景春、唐正大、王灿龙、吴福祥、项梦冰、肖晓晖、邢向东、徐丹、杨荣祥、杨永龙；法国学者包括Alain PEYRAUBE(贝罗贝)、Christine LAMARRE(柯理思)、Ekaterina CHIRKOVA(齐卡佳)、Françoise BOTTERO(蒲芳莎)、QI Chong(齐冲)、Redouane DJAMOURI(罗端)、Victor Junnan PAN(潘俊男)、Waltraud PAUL(包华莉)、XU Dan(徐丹)。报告论文内容涉及汉语汉字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语言类型学研究、语言接触研究等多个领域。

(杨永龙)

LI Xuping, On the definiteness of nominal phrases in Wu Dialects: A case study of the Fuyang diale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finiteness of four types of nominal phrases in the Fuyang Wu dialect, namely, Noun Phrases (NP), Classifier Phrases (CIP), Number Phrases (NumP) and Demonstrative Phrases (DemP). The paper argues that (i) NPs in Fuyang Wu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generically, regardless of being modified or not; (ii) a classifier is needed to turn bare nouns from kind denotation to properties, and CI-N is ambiguous between indefinite and definite readings, and a modifier before CI-N always contributes to a definite reading; (iii) NumPs tend to read as indefinite, but the approximative *liang* ‘several’ is an exception in that it can be interpreted with a definite reading; (iv) as far as demonstrative phrases are concerned, the relative clauses can only occur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demonstrative when modifying demonstrative phrases.

Key Words: bare noun, classifier, demonstrative, generic, definite, indefinite

WANG Fang,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s in the Guangshan dialect with a preliminary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wo complementarily distributed universal quantifiers “[xɔ³¹]” (下) and “[tsəu³¹]” (就) in the Guangshan dialect, a variety of Zhongyuan Mandarin spoken in Henan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i) In contrast to “[xɔ³¹]”, which is used for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over individuals, “[tsəu³¹]” may universally quantify over events, or individuals when accompanied by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wh*-words or A-not-A structures; (ii) For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over individuals, the quantified expressions of “[xɔ³¹]” can only b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individuals, whereas the quantified expressions of “[tsəu³¹]” are mostly associated with non-specific ones. This on referentiality distinction also correlates with other syntac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quantifiers, such as types of predicates. Both stage-level and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 can be found in clauses containing the quantifier “[xɔ³¹]”, while typically only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 are allowed in clauses containing the quantifier “[tsəu³¹]”. “[xɔ³¹]” and “[tsəu³¹]” also differ with respect to subjective modality in that the former may be used in the description of an event or a characteristic, while the latter is employed usually in commentaries. Based on the evidence from neighboring dialects and diachronic Chinese tex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yntactic differences of the two quantifiers might be attributed to their diachronic sources. The origin of “[xɔ³¹]” can be traced to the word *yixia* (一下), which indicates the completion of an action within a short period, while “[tsəu³¹]” may derive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al reading from its co-occurrence with concessive conditional clauses. Finally, this paper extends the investigation to universal quantifier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and offers an account of the general tendencies and variability found in the collected data.

Key Words: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xɔ³¹] (下), [tsəu³¹] (就), typology

LI Qiang, YUAN Yulin, Distinguishing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dou* (都) and *zhi* (只)

On the basis of Pan (2006) and Hu (2009), this paper makes a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words *dou* (都) and *zhi* (只).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urface meaning of *dou* and *zhi*: the former means “to gather and summarize”, whereas the latter means “to limit and exclude”. However, a similarity exists behind the difference: they both trigger the exclusive mea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tivation of exclusive meaning of the *dou* sentence, mainly discussing the peculiarity and constraints of *dou* and *zhi* on the associated object,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predicate verb and the topicalization and relativization of focus. It is shown that, under an exclusive semantic environment, *dou* and *zhi* hav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